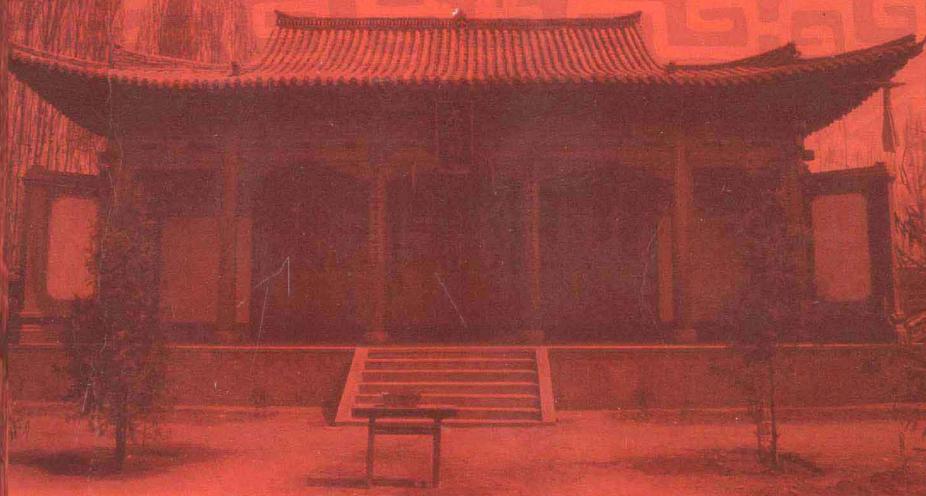


景军 著

神堂記憶

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



神堂記憶

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

景军 著 吴飞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景军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7

书名原文：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ISBN 978-7-5334-6068-6

I. ①神… II. ①景… III. ①家族—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5194 号

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by Jun Jing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96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 sup. org

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
景军 著 吴飞 译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 fep. com. 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591-87115073 83752790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大兴黄村镇三间房村委会北 500 米 邮编：102600)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44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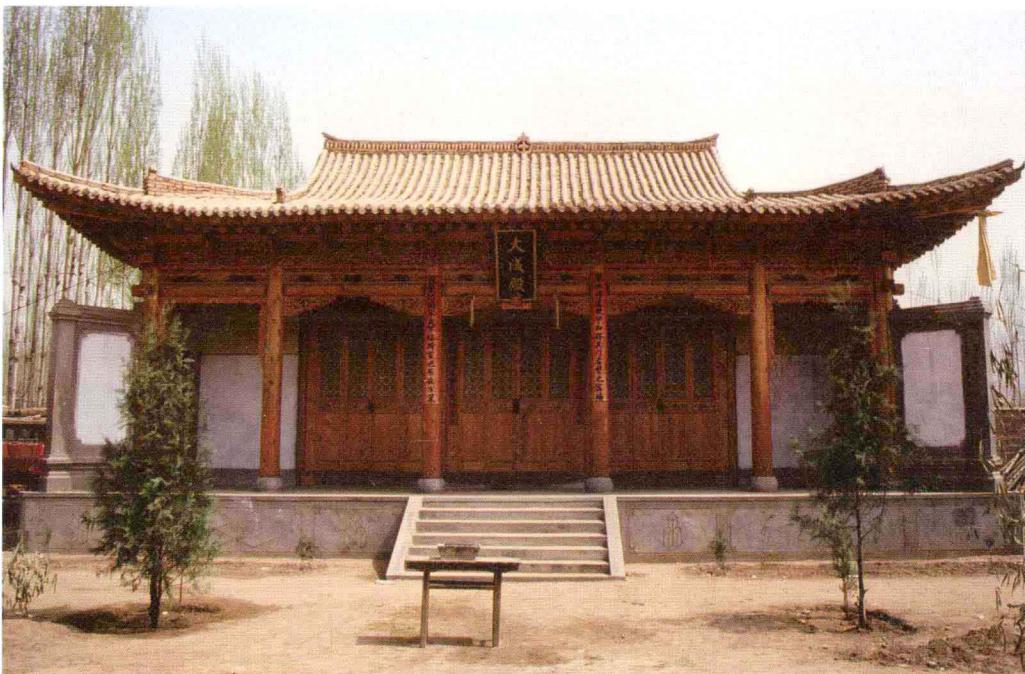
插 页 5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6068-6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部（电话：010-62024258）联系调换。



大川孔庙外景（1992年，景军拍摄）



大川孔庙管理者（1992年，景军拍摄）



小川孔庙新型孔子坐像
(1992年,毛珍妮拍摄)



孔繁钧与孔祥国在讨论祭文措辞问题
(1992年,景军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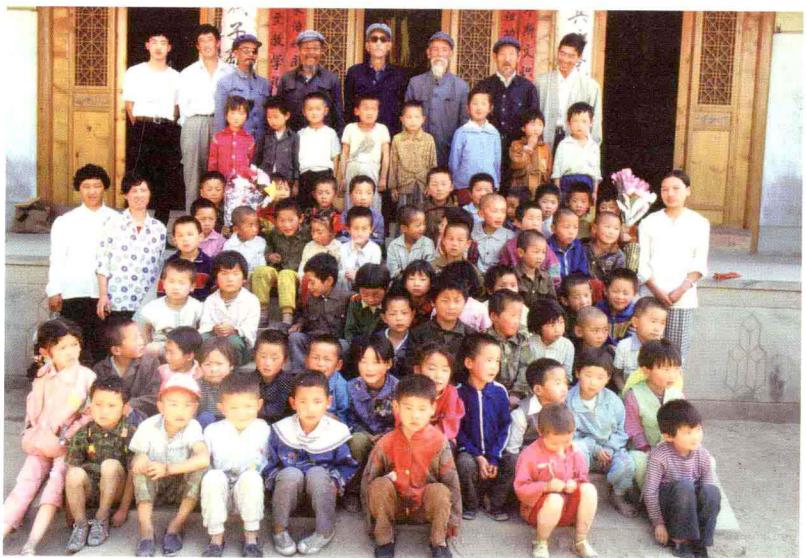
小川孔庙对外开放的第一天（1992年，景军拍摄）



负责修复孔庙的老者披上村民献上的彩色礼帛（1992年，毛珍妮拍摄）



衍圣公孔德成手书横幅从台湾转到大川村书记孔焕德和村长孔维科手中（1995年，景军拍摄）



永靖县第一个农民子弟学前班在大川孔庙建成（1992年，毛珍妮拍摄）

英文版鸣谢

本书初稿之所以可以在 1994 年夏完成，全凭很多人的大力帮助。我对屈佑天（James L. Watson）先生的感激难以言传。作为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他最先鼓励我到中国西北研究社会记忆问题。同时，我深深感激哈佛大学张光直（K. C. Chang）教授和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张先生的幽默感和乐观主义曾不止一次激发了我的读书热情；凯博文先生的渊博和卓见令我受益匪浅。

我在哈佛的学术之旅之所以那么妙趣横生、收获丰富，多靠其他老师的鼓励。我特别应该提到托马斯-巴菲特德（Thomas Barfield）、肯尼斯-乔治（Kenneth George）、麦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quhar）、大卫-梅伯利路易斯（David Maybury-Lewis）、撒利-莫尔（Sally Moore）、保琳-彼得斯（Pauline Peters）、帕克尔-西普顿（Parker Shipton）、斯坦利-汤拜亚（Stanley Tambiah）、华曲若壁（Rubie Shwartz）。

Watson)、努尔-亚尔曼 (Nur Yalman)、罗宾-叶茨 (Robin Yates)。

上述具有强烈责任心的教员兼大学者非常理解地倾听我的研究汇报，对我给予无私的指导。在我的心中，这些学者占有的位置极为特殊。

很多人在阅读了部分手稿或倾听了我的设想之后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其价值无法衡量，更难以回报。为此，我需要鸣谢耶鲁大学的萧凤霞 (Helen Siu)、波士顿大学的魏勒 (Robert Weller) 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阎云翔。当写作进入最紧张的阶段的时候，几位朋友提供了技术和感情支持。其中包括朴相美 (Sangmee Bak)、玛利斯-吉利特 (Maris Gillette)、利达-荣汉斯 (Lida Junghans)、马太-科尔曼 (Matthew Kohrman)、卢启文以及王道寰。

一些基金会和学术机构提供了使本研究得以实现的“铁饭碗”。1989 年夏天，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给了我第一次在中国西北从事研究的机会。1991 年，一项支持夏季研究的麦伦奖学金 (Mellon Fellowship) 帮助我从美国前往甘肃省。1991 年，皮波第成果奖学金 (Peabody Merit Scholarship) 支持我做了一学期的论文开题研究。1992 年，一项外语与地区研究奖学金支持我在甘肃的档案研究和方言训练。1992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支持人类学研究的温纳 - 格林基金会 (Wenner-Gren Foundation) 资助了我在 1992 年从事的田野工作。又一项麦伦奖学金资助了

我1993年在台的档案研究。在台湾的逗留期间，我受到中研院李亦园、庄英章、王道寰先生的关照，由他们安排对孔德成先生的采访。伍得罗·威尔逊基金会（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提供的夏洛特W.纽康波博士论文奖学金（Charlotte W. Newcombe Dissertation Fellowship）资助我完成了论文写作。

对于所有这些机构和人物提供的支持，我感激不尽。

在修改的关键时刻，哥伦比亚大学的孔迈隆（Myron Cohen）教授仔细阅读了初稿。他提出了很多精辟建议，对于书稿的出版颇有帮助。作为责任编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玛利尔·贝尔（Muriel Bell）女士以热情支持和编辑建议的方式伴随我走过了写作的最后阶段。

对于我的父母，景瑞银和李蕴璞，我致以特殊的敬意，尤其要感谢父母对我的信念。我将最深切的感激给予我的妻子毛珍妮，因为她扩延了我对人类同情的心灵边界。

特别需要感谢的其他人包括苏阳、王亚雄、王卫民、杨念群、王甘、那红、吴江七名同事和朋友；我在甘肃的研究得到了这些朋友和同事的直接支持。

我最应鸣谢的人们当属甘肃省永靖县刘家峡大川村的干部和老百姓。大川人的合作使我顺利完成田野调查。在此尤其要感谢

孔庆达、孔庆培、孔繁荣、孔祥信、孔祥贤、孔令瑞、孔令述、孔繁钧、孔繁恩、孔祥彦、孔祥国、孔祥兰、孔维科、孔令玉、孔换德、孔繁苗以及当时的村干部对我的照顾。这些人，还有大川的其他村民，才是本书实至名归的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记忆	// 2
第二章	历史记忆	// 28
第三章	恐怖记忆	// 52
第四章	苦难记忆	// 78
第五章	仇恨记忆	// 98
第六章	仪式记忆	// 114
第七章	族谱记忆	// 128
第八章	文化象征记忆	// 160
第九章	寻访记忆在陇中	// 180
参考文献		// 195

神堂记忆

第一章

社会记忆

夷平的村庄

大川村的孔家人不会忘记三十多年前那个天崩地裂的冬天。那是在 1960 年发生的一场毁村事件。在“大跃进”的刺激下，地方官员指天誓日，急于在水利工程中大显身手，为此宣布大川居民必须在秋后从家乡迁走，给一座大型水电站腾地让道。大川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先是忽视，而后抵制着搬迁命令。^[1]

要知道，孔家人作为孔圣人的后裔迁移至此且居住了几百年，怎么能一下子舍弃世代厮守的丘墟田园？况且，正如其中一人所说，如此浩荡的黄河怎能被拦腰斩断？此前，中美工程师已经在本地修建电站的尝试中受挫而退。^[2]

岁月缓缓流逝，最后期限已到，孔家人仍安之若素。结果，在十二月份的一个寒冷夜晚，被调遣而来的民兵抵达大川，强迫村民编队离开。民兵的第一批目标是那些没有壮小伙儿的家户。老太太们呼天喊地，趴在炕上不肯离开，最后还是被架走。随后，房梁被民兵套上绳索，用骡子拉塌。破晓时分，人们在恐慌中自己动手拆房揭瓦，试图抢下部分建筑材料另起居所。之后，人们匆匆忙忙地掘开祖坟，将先人骨殖装进水泥袋或别的容器，搬到高坡重新安葬。这一做法违背了当地人的传统丧葬习惯。多

[1] 这个大坝工程即盐锅峡水电站。作为黄河上游第一座以发电为主的水电工程，它的建设时间与黄河下游的三门峡水电站建设同步。参阅 Greer, 1979 年；王卫民，1989 年。

[2] 国民党政府在 1945 年曾派了中美水利专家联合组到永靖勘察水电站坝址。由于国共全面内战的爆发，修建电站的计划无法实现。见永靖县志办公室，《永靖县志》（油印本），1992 年，第 16 卷。

年之后，一位老人回忆说：“没有时间顾那么多了。”由于已经筋疲力尽，大川人放弃了更为久远的祖坟。不久，中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饥荒席卷而来，被迫搬迁的创伤变得更深。^[1]

饥饿与惊恐伴随着大川半数左右的村民搬迁到附近村庄，其他人爬上不远的山坡地。按照计划，一座高达 57 米的大坝在大川下游拔地而起，1961 年 3 月 31 日下闸蓄水将中国第二大河截断。48 小时后，大川村淹没，消失在电站水库形成的一片汪洋之中。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大川村的毁灭作为一系列悲剧的核心事件埋在孔家人心底。解放前，孔家人在当地势力雄厚，无论在社会地位或声望意义上都象征着新政权意欲取代的旧秩序。在解放后近 30 年的时间内，被当做旧秩序残余势力的孔氏宗族不断遭到无情打击，尤以几次政治运动为甚。^[2] 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生活环境的逐渐宽松，部分孔姓子弟才重新抬起头来，以要求追加水库移民赔偿的行动作为集体疗伤的手段之一。

我是在 1989 年夏天与孔家人走到了一起。那时，我在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从事水库移民研究，项目指导老师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费先生曾建议将西北水利工程导致的移民安置问题作为一个发展问题研究课题。事实上，所里初期的水库移民研究已经在三峡水利工程的论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当时，学校无法正常运行，朋友们自顾不暇，我也就无心留在北京。于是，我们几个人决定到西北继续研究水库移民问题。该年 6 月，我和一位同事与两名研究生结伴西进甘肃，第一次接触到

[1] 大跃进导致的严重挫折。见 Kane, 1988 年。

[2] 关于发起这场运动的原因，见第三章的讨论。

大川孔家人。最初，我将这次经历仅仅视为一次短期研究而已，主要针对水库移民安置问题。但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期间，我决定继续关注大川。为了做好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准备，我在1991年夏天重访大川。接着，我在1992年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在大川蹲点。在1993年论文写作期间以及1995年准备出版论文之前，我回到大川做补充调查。在反复几次的实地调查中，我不仅了解到有关移民安置问题，而且熟习了当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改革开放后村民的生活状况。

回想起来，第一次远足大川就使我在田野中步入社会记忆研究领域。对学者而言，社会记忆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考察群体需求与集体利益对个人记忆形态及具体内容的动态性影响。我们在下文会看到，大川是社会记忆研究的理想场域。

田野工作地点

大川村位于甘肃省会兰州西南方八十公里左右。从地图上看，甘肃是一个狭长的条带，陕西在东，四川在南，新疆在西，青藏高原在西南，宁夏和内蒙古在北。这也就是说，甘肃形成了一个走廊，将中国腹地同中亚地区连接起来。它西面的中亚是一块广阔的地域，散居着藏族人、维吾尔人、回族人以及其他许多少数民族。几百年来，中央政府要想控制西北边陲，必须依靠甘肃这个咽喉要地。